

本文章已註冊DOI數位物件識別碼

▶ 從中國首都計畫史論唐代長安城

The Capital Planning of T'ang Ch'ang-An, from a Historical Perspective

doi:10.6154/JBP.1983.2.019

建築與城鄉研究學報, (2), 1983

Journal of Building and Planning, (2), 1983

作者/Author: 陳妙香(Miao-Hsiang Chen);Naba, Tosisada

頁數/Page: 313-331

出版日期/Publication Date: 1983/06

引用本篇文獻時，請提供DOI資訊，並透過DOI永久網址取得最正確的書目資訊。

To cite this Article, please include the DOI name in your reference data.

請使用本篇文獻DOI永久網址進行連結:

To link to this Article:

<http://dx.doi.org/10.6154/JBP.1983.2.019>



DOI Enhanced

DOI是數位物件識別碼 (Digital Object Identifier, DOI) 的簡稱，是這篇文章在網路上的唯一識別碼，用於永久連結及引用該篇文章。

若想得知更多DOI使用資訊，

請參考 <http://doi.airiti.com>

For more information,

Please see: <http://doi.airiti.com>

請往下捲動至下一頁，開始閱讀本篇文獻

PLEASE SCROLL DOWN FOR ARTICLE



從中國首都計畫史論唐代長安城*

陳妙香譯**

THE CAPITAL PLANNING OF T'ANG CH'ANG-AN,
FROM A HISTORICAL PERSPECTIVE*

by

NABA, TOSISADA

Translated by

MIAO-HSIANG CHEN**

民國70年1月28日收稿

*譯自那波利貞著「支那首都計劃史上より考察した爲唐の長安城」，「桑原博士選曆紀念東洋史論叢」，一九三一年頁一二〇三~一二七〇。

**台灣大學歷史系畢業

Manuscript received January 28, 1981

* by Naba, Tosisada, "Kuwabara Memorial Volume" Kyoto, 1931, pp. 1203-1270.

** Graduate, Department of History, National Taiwan University, Taipei, Taiwan, Republic of China

一

唐代首都長安城是沿用隋文帝開皇二年（西元五八二年）六月所建的新都整建而成的，茲不贅言。隋代的新都即唐代的長安城是由宮城、皇城（俗稱子城）、外郭城三部分構成，一般通稱隋朝的為大興城，唐朝的為長安城或京師城。但嚴格地說，隋唐所謂的宮城指的是宮城部分，皇城指的是皇城或外城部分，而隋代大興城及唐代長安城所指的只是外郭城部分而已。這種說法是根據宋朝宋敏求之「長安志」卷七、唐京城條，其文如下：

外郭城。（隋曰大興城。文帝初封大興公。及即位以名城縣門殿園池及寺焉。唐曰長安城。亦曰京師城。）東西一十八里一百一十五步。南北一十五里一百七十五步。周六十七里。其崇一丈八尺。（隋開皇二年築。永徽四年率天下口稅一錢。更築之。）

因此，隋代大興城指的只是外郭城這一部分，並不包括宮城與皇城；唐代長安城所指亦同。但本文為求方便起見，沿用了當時及後代的一般通稱，將宮城、皇城、外郭城總稱之為「隋代大興城」、「唐代長安城」。

其次，隋代大興城為唐代襲用以來，坊制及其他方面多少有所變動，其中最明顯的是宮城東北城郭外新建了大明宮即蓬萊宮，因此南面五門中的正門丹鳳門門前新設有大街道，而將原翊善坊分割成翊善、光宅二坊，將原永昌坊分割為永昌、來庭二坊；宮城、皇城東西兩側各坊，原則上東西寬為六百五十步，而在此便產生了例外的四個小坊。從春明門一進城北側的興慶坊全部，永、安興二坊之南部或東南部及其西側勝業坊的東部是興慶宮的所在，亦即俗稱的南內；這些的設立本應一一列舉，但若討論這些變動，在本文對其「首都計畫」（Capital City Plan）作通盤評論時會產生頗大的障礙，因此不擬加以詳細說明。

此外，唐代長安城幾乎完全沿襲了隋代大興城，所以討論唐代長安城的都市計劃實即討論隋代大興城的都市計劃，因此以「從中國首都計劃史論隋代大興城」作為本文題目應較適切，但是大興城在隋代是新都，事實上仍以東都洛陽為首都，較具重要性；況且隋代不過短短的二十八年；反之，唐代長安城是實際的首都，唐朝國祚有二百八十多年之久，以唐代長安城稱呼此一都城較為一般人所熟悉，為方便起見故以此命題，尚請讀者諸賢諒察。

二

唐代首都長安城就都市而言，它的價值從全盛的觀點

來看有優點也有缺點，甚難一概而論。但就東方的習俗：提高帝王的威嚴、誇耀京城的壯觀方面來說，在中國可謂空前絕後，而其規模之大也是世界上獨一無二的，其都市計劃秩序的完整與宏大、內部道路的寬廣，由某種意義看來，都是古今世界第一等的大都市。日本即仿長安而建了奈良平城京、京都平安京。

然而，隋文帝在開皇二年計劃建設這個都城時，是否懷有某種「都市規劃」（City Plan）的理想呢？不幸的是這種理想抱負在「隋書」地理志或「新唐書」、「舊唐書」的地理志以及其他有關隋代大興城、唐代長安城的文獻中都沒有記載。但是，若說新都新建之時，全無一預設的方針，却也是極不可能的。

中國一般都市的形成可分為兩大類型，首都亦然。第一種是依據自然發展的結果加以市區整治，之後在四周圍以城壁，而整頓成有冠冕形式的首都，這可以舉西漢首都長安城為例。西漢首都長安絕非自始便按照都市計劃建造的，而是利用秦代以來渭水南方既有的帝王離宮、宮殿或是沿用諸宮殿殿制逐年修建，而使之更壯嚴。由於是首都的所在，歷經十餘載的歲月，人民聚居而成為大都市，又加以相當的市區整治，惠帝時更築造了周圍的城牆，而完成了西漢首都的大觀。其證據由未央宮、長樂宮的沿革來探討其為明確。漢代之「三輔黃圖」（作者佚名）卷二，漢宮條曰：

長樂宮。本秦之興樂宮也。高皇帝始居櫟陽。七年長樂宮城。徙居長安城。三輔舊事宮殿疏皆曰。興樂宮秦始皇造。漢修飾之。

未央宮。漢書曰。高祖七年蕭何造未央宮。立東闕北闕前殿武庫太倉。上見其壯麗之甚。怒曰天下何匈勞苦數歲。成敗未可知是。何治宮室過度也。

即整建秦代興樂宮，加以增草損益，而以鴻台、臨華殿、溫室殿、信宮殿、長秋殿、永壽殿、永寧殿等諸宮殿群集成為長樂宮，大約是在高祖七年（西元二〇一年）之前完成，其地理位置受秦代興樂宮的位置所困限。同年完成的未央宮雖然不是特別利用秦代宮殿舊址，不似長樂宮之受人為及傳統因素所限制，但是活用龍首山丘陵而建的宮殿，則仍受天然地勢的限制來決定其位置。長樂、未央兩宮位置東西相隔，其間的空地以及兩宮周圍，逐漸地有王侯宅第、平民住家、商舖等等的聚集，如此，則仍是自然發展成的帝都；至於其城壁如「漢書」惠帝本紀所記，是由惠帝元年春天至五年秋天，前後分五次築造，則長安成為首都的體制是在惠帝時完成的。由上所述，漢朝首都長安的形成經過，在高祖時對於都城的規劃並無一定的

指導方針是很清楚的，只知將街道規劃成棋盤式而已。就當時城牆築設的計劃看來，絕非長方形或正方形，而是一種不知其所以然的不規則形式。即北邊城牆中有洛城門、東有利城門，由此向東延伸的城壁則向北方凸出。南邊城牆，其中的覆盎門、安門、西安門並不在同一東西直線上，靠近中央安門的部分最向南突出，東邊覆盎門旁邊則是最偏北的部分，西側西安門部分位置介於前二者之間，這種現象是由於渭河自北東流，同時長樂、未央二宮周圍自然發展出來的都市區域，盡被包括在都城範圍內，而後再築造城壁所產生的結果。中國學者自古便認為此種都城的形制是南方象南斗的形狀，北方象北斗的形式，事實上都是看了實物後再加以附會連想而給予的解釋。但在文學作品中存有關於漢代長安的記述，「文選」卷二、東漢張衡的「西京賦」有：

郭開九市。通闔帶關。旗亭五重。俯察百廛。

這樣的記載，稱頌在城門外發達起來的商業區的繁榮景象，「文選」卷一、班固「西都賦」對城內街衢也有同樣的描述：

披三條之廣路。立十二之通門。內則街衢洞達。閭闔且千。九市開場。貨別隧分。人不得顯旋車不得旋。闔城溢郭。旁流百廛。

根據以上的說法，長安之為漢代首都並非最初就已決定，大約是至惠帝時，修築城牆後加以市區整治、規劃而完成的結果，這種現象可藉文學方面的記述想像出來。

第二種都市形成的方式是在建設之初便已預先設計了所希望的都市覽圖。按照這種都市計劃實行而產生的都市，多半是按照預定的方針在偏荒地帶新建，或者是改造、利用舊有的都城而成的；隋代大興城、元代大都及明代之北京城都是實例，唐代長安城即屬此一類型。

隋文帝開皇二年六月下令興建的大興城，位置是在漢代長安城東南的龍首原，所以大興城的範圍應當為漢代長安城外東南的郊坳地區。當時可能與現在西安府城外的景觀一樣，是一片麥田與墳地。中國的習俗中墳地都在都邑城外。習慣上一個地方成為首都後城內的古墳都要移往城外去，所以漢代的長安城時代及東漢、魏晉、南北朝時，群雄的首都或是雍州地方的古都概皆如此。西漢長安城所在的範圍內，城內居民皆以城外龍首山邊為其墳場。隋文帝在此建設大興城時，城內古墳也都儘量地改葬遷移至城外。宋代宋敏求所作的「長安志」卷七、常樂坊一條，提到蝦蟆陵，引用了唐李肇所著「唐國史補」中所記：

〔常樂〕坊內街之東。有大家。俗誤以為董仲舒墓。亦呼為蝦蟆陵。曲中出美酒。京都稱之。國史補曰。董仲

舒墓。門人皆下馬。故謂之下馬陵。諺為蝦蟆陵。而唐代白居易的「琵琶行」詩中亦提到：

自言本是京城女。家在蝦蟆陵下住。十三學得琵琶成。名屬教坊第一部。曲罷常教善才服。

此蝦蟆陵遺存在常樂坊，可作為隋代大興城、唐代長安城的範圍是在以往漢長安城東南部郊坳墳地的一項證明。雖然「長安志」中未予指出，但清代徐松所著「唐兩京城坊考」卷二，永樂坊一條，便指出古冢的遺存，並引述了唐代李匡又「資暇集」及韋述「兩京新記」的記載：

在〔永樂〕坊內橫街之中。李濟翁資暇集云。永樂坊。內古冢。今人皆呼為東王公墓。有祠堂加其上。俗以祈祀。稱造化東王公大謬也。案韋氏兩京新記云。未知姓名。時人誤為東方朔墓也。當時人已誤。今又轉東方朔為東王公。後代必更轉為東里子產矣。

古冢的遺存，在唐代李復言之「續云怪錄」記有：

張度舉進士。居長安昇道里。南街盡是墟墓。絕無人住。

這些關於墓墟遺存的記載，都可作為佐證。即常樂坊、永樂坊、昇道坊是古墳地的所在，因此隋代大興城即建在漢代長安城東南之郊坳地區，能不受地理及傳統因素的限制，在廣闊的龍首原上自由選擇地點，而在其範圍之內的古墳，大致都遷往此一新都城的城外。「太平廣記」卷三百二十八、鬼類十三條題為「劉門奴」引用「廣異記」記述如下：

高宗營大明宮宣政殿。始成每夜聞數十騎。行殿左右。……高宗乃使術者劉門奴問其故。對曰。我漢楚王戊之太子也。……王起兵時。留君在長安。……後以病死。葬于此。天下憐我。殮以玉魚一雙。今在正殿東北角。……此是我故宅。今既在天子宮中。乞改葬我于高敞美地。……帝令改葬。發其處。果得古墳。棺已朽腐。傍有玉魚一雙。

記載了隋代大興城城外徙葬古墳的地區，至唐代時已劃入大明宮的範圍。隋代大興城創建的情形大致如此，若預先有都市計劃的擬定，則此一都城就是按照計劃理想全盤實施完成的。

然而，隋文帝究竟有着什麼樣的都市計劃覽圖，至今在文獻中仍無法得知，但是應當是有若干的理想促使其如此地實行。隋代大興城即唐代長安城疆域為東西寬十八唐里又一百十五步，南北長為十五唐里又一百七十步，是一東西較寬的矩形。中央偏北的位置是為宮城與皇城，皇城區的東南及西南角外各設有都會市（唐代稱東市）及利人市（唐代稱西市），城內坊制井然排列，而以貫通南北的十一

條交通幹道與東西的十四條幹道交錯形成井字形，造成令人驚歎的棋盤日式街道，以朱雀門大街為中心，東西兩旁左街與右街互相對稱。這種現象不外證明了這個都城是依某一理想的建設計劃完成的，與西漢長安城，四周之不規則、未央、長樂兩宮在城內的位置並不統一，是不可相提並論的。從任何觀點看來，這一個都城的規律性、統制性皆被完美地發揮，這也證明了必有一都市計劃的理想作為其實現的依據。

三

然而，此一首都的建設計劃，絕非只由隋文帝以及參與此事的左僕射高穎、太子左庶子宇文愷、將作大匠劉龍、工部尚書鹿鹿郡公賀樓子幹、大府少卿高龍義等人相互協商便達成這一個在中國史無前例的首都建設計劃。

自古以來中國對於首都的建設便有傳統都市計劃的構想存在。在古代是否曾實行，無法確知，但其存在是極明顯的。雖然這種構想起源的根據以及年代很難明確考證，但至少在西漢初之時就已存在，一般以為與井田制有關，但也很難在古書中找到確切的紀錄。傳統首都建設計劃的構想即所謂王國經緯塗軌，可見之於「周禮」冬官、考工記、匠人條內，「周禮」的制作年代自古就有許多爭議，很難斷言是西周的作品，但至少可以確定是在東周末期至西漢初期，從以下匠人條的記載看來，存有關於傳統計劃構想是無法被否定的。其文為：

匠人營國。方九里。旁三門。中九經九緯。經塗九軌。左祖右社。面朝後市。市朝一夫。

其中提到的「國」字的意義，根據「禮記」內則篇所記：

周人養國老於東膠。養庶老於虞庠。虞庠在國之西郊。

可知「國」即首都之同義字，此種首都建設計劃，城為九里四方，每邊三個門，共設十二門，連接這十二個門有六大幹道，每二主要幹道間再劃分第一、二等幹道，是以形成整齊的棋盤式街道；貫通南北的直線幹道有九，東西橫貫幹道亦有九，互相垂直相交構成六十四個小區域。中心位置部分的四個或十六個小區劃地則為宮闕的所在；宮闕區域的北半部是為宮城，乃帝王之私邸，南半部為皇城是帝王的公邸，換句話說即是朝廷。皇城前禁止有民家的存在，宮城範圍以外的都城北部是商賈買賣市場的指定地，在此指定的範圍內才允許商業的存在。所謂的左祖右社是指宮城、皇城的範圍外的左方（即東邊）設有宗廟，右方（即西邊）設有社稷，都是祭祀的場所。建國之初，根據

「周禮」夏官司馬下、土方氏之職條曰：

土方氏。掌土圭之法。以致日景以土地相宅。而建邦國都鄙。

可知土方氏是以土圭測日影，俾使首都區域的正方形形狀正確地與東西南北四個方向相合。若宮城皇城乃至於首都正門的位置都一律按照這種計劃正朝南面的話，則上述匠人條的記載中所謂「國」（即首都）的正面必然是朝向正南方了。致於左祖右社、前朝後市的想法其根源甚難確知，一般而言，左表人道，右表地道，故左設宗廟，右設社稷，而朝為義之所在，市為利之所在，先義後利，故宮闕前半部（即南半部）設朝廷，而宮城皇城之外才設市。這些現象的所以然並非問題的所在，唯中國傳統首都建設計劃的構想，自周末漢初以來前朝後市、左祖右社、中央宮闕的觀念即已存在而受到極大的重視，若能明此則有助於本文的研究。

這種在都市計劃中前朝後市、左祖右社、中央宮闕的想法常可在經典中見到，不僅「周禮」考工記、匠人條有此記載，「欽定禮記義疏」之附錄刊有「禮器圖」卷一，其朝市廛里一條有如下的記述：

建國之法。前朝後市。左右三廛。朝有三。一曰外朝。二曰治朝。三曰內朝。周禮宰夫掌治朝之法。以正王及三公六卿大夫群吏之徒。

古人立國都。亦由井田之法。畫為九區。中間一區為王宮。前一區為朝。而左宗廟。右社稷。在焉。後一區為市。而商賈萬物聚焉。左右各三區皆民所居。為民廛。君立朝而後立市。固以寓先義後利之權。君主中而市廛皆居外。又以見居重馭輕之勢也。

此一圖說與宋代聶崇義所作的「新定三禮圖」相似，朝鮮刊本的「周禮正義」所附的「周禮經圖」中刊載有「王國經緯塗軌圖」。上述「周禮經圖」所錄的「王國經緯塗軌圖」是根據聶氏「新定三禮圖」卷四「宮室圖」所載的王城圖而來的，於此不作說明。

由簡單的圖示可以看出「周禮經圖」所載「王國經緯塗軌圖」（圖1）即聶崇義「新定三禮圖」卷四「宮室圖」，其所繪之王城形制與「欽定禮記義疏」所附「禮器圖」卷一的「朝市廛里圖」（圖2），其間有若干的差異，雖然同是左祖右社，但前者設於王宮之左右，後者則設於王宮前御道的兩側。但即使有這些佈局上的差異，其佈置所根據的來源畢竟是一致的。雖有某些不同，兩者共同具有前朝後市、左祖右社、中央宮闕、左右民廛等構想，是絲毫不相矛盾的。至於，前朝後市以先義後利來解釋是否

圖1 「周禮」附錄「周禮經圖」所載「王國經涂軌圖」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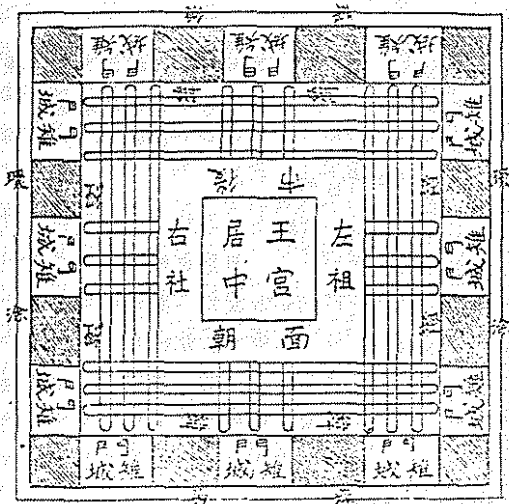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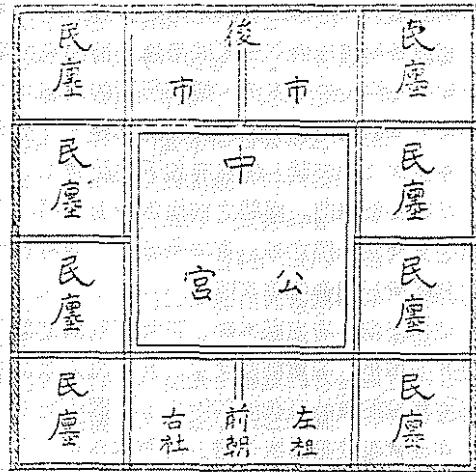


圖2 「欽定禮記義疏」附錄「禮器圖」所載「朝市塵里圖」



否合宜，這個問題並非本文直接的研究對象，只求明白這種傳統的首都建設計劃構想早在東周晚期就已存在，明白了這點，對於本文所探討的問題便無所障礙了。實則，這種首都建設計劃的構想在東周末期是一既存的事實，其特徵與原則可歸納為以下數項：

- (一) 首都都城各面有三個門，共十二門，連結這十二個門為劃定的交通幹道，將整個都城區域棋盤式的分為九等分。
- (二) 宮闕區域位於此九等分的中央位置。
- (三) 都城內，宮闕區以南的區域不許有民家的存在。
- (四) 宮闕區域南半部是朝廷所在地；北半部則為宮城所在區域，此區域以北至都城範圍內為市場的所在。
- (五) 宮闕區外之東側設宗廟，西側設社稷壇，或者，宗廟設於宮闕正門直通南面的御道東側，社稷壇則在西側，無論如何，都維持左祖右社的模式。
- (六) 棋盤式劃分成九等分區域，宮闕區域以外，都城內東邊的三區及西邊的三區，共六區，是為民家所在的區域。

要言之，即是前朝後市、左祖右社、中央宮闕、左右民廛的原則。這種構想頗值重視，可說已是中國首都規劃中不可動搖的金科玉律，其影響甚至及於明代北京城的建立。

如上所述，在中國首都建設計劃構想中，至少在周末漢初已存有前朝後市、左祖右社、中央宮闕、左右民廛的觀念。但是，漢代長安城，如前所論，是由自然發展而後加以整治的，因此傳統都市計劃無法充分的發揮，唯各邊

皆設三個門，東面自北而南有宣平、清平、覆城三門，南面自東而西有覆盎、鼎路、西安三門，西面自北依次為雍、直城、章城三門，北面由西依次為橫、洛城、利城三門，共十二門，合乎傳統的首都建設計劃，此外也建造了幹綫連結這十二個門。其他則長樂、未央兩宮位置各偏東西，未央宮以南面的門為正門，但使用時靠近西安門，不易顯示宮闕的威嚴，故特設東闕、北闕以使用正門，雖然未央宮諸殿的設立是朝南的，但實際上正門是為東闕、北闕所使用，遂產生與中國帝王坐北朝南的位置不一致的結果。西漢首都長安城的都市規劃與中國傳統建都構想有所違背之處，是因為西漢長安城的形成是屬於前述第一種都市形成類型，為惠帝時加以草率的整治完成的，可說是中國歷代首都中所見到的一個較特殊的例子。

以上乃在說明左祖右社、前朝後市、中央宮闕、左右民廛的首都計劃構想長久以來已成為中國的傳統原則，至明代更成為慣例。以下欲就歷代首都建設的主要計劃加以討論，並以簡略的例子作為例證。本文並非以解說歷代首都史為目的，故專就都市計劃相關部分提出討論。

漢代長安城之後出現的第二個例外的都城是三國魏都鄴城，嚴格的說當是指後人所謂的鄴都北城，營建的地點是在漳水南岸，洹水西北，即今河南省彰德府臨漳縣以西二十里處，這點在此不擬多作證明。根據北魏酈道元「水經注」濁漳水條及清代趙一清「水經注釋」卷十，濁漳水條的記載，可知其東西全長七里南北五里，雖無法以今日的尺度標示出來，但仍可知其面積甚廣，為一東西較寬的長方形都城。南面由東依次為廣陽、中陽、鳳陽三門；西

面則有一門名爲金門又名白門；東面有建春門一門；北面由東依次爲廣德、廡二門，共有七個門，由漳水流入的水流在金門北方靠近西面城壁之銅雀台邊形成伏流而流入城內，再經長明溝流過宮闕區域南邊，而向東由春明門北方流出城外，注入洹河支流。這裏所謂的鄴都北城即是曹魏的都城，與鄴都南城有嚴格區分的必要。「文選」卷六，晉代左思之「魏都賦」的注有如下的記載：

文昌殿前值端門。端門之前南當南上東門。又有東西上東門。端門之外。東有長春門。西有延秋門。

文昌殿所以朝會賓客享四方。

鄴城內諸街。有赤闕黑闕。正當東西南北城門。最是其通街也。石竇橋在宮東。其水流入南北里。

對於鄴都有詳細記載的晉代陸翽所著的「鄴中記」原本今已佚失，在「武英殿聚珍版全書」內將其他書中引用該書佚文彙集而成的「鄴中記」其中記載有關首都計劃的討論與考據部分亦已佚散。然而由上述「魏都賦」的注中對於整個規劃的大概仍可得知，鄴都北城亦遵照了傳統左祖右社、前朝後市，中央宮闕、左右民廛的原則。其證據有好幾項，上述記載中的文昌殿相當於宮闕區域中心的主要建築物連結廣德、廣陽二門的南北縱貫幹道與通過建春門的東西橫貫幹線垂直交會，形成十字街衢，而連結廡門、鳳陽門的南北貫通幹線與通過金門的東西橫貫幹線同樣也垂直相交成十字形街衢，而赤闕與黑闕即設於這二個十字街衢上，此二街衢想必相當於現在北平的東西牌樓與西四牌樓。而長明溝的支流流入石竇橋西方的南北里，可見鄴城內北部是有市街的存在，以文昌殿爲中心的宮闕區域位在城內中央偏北的地方，但並非如唐代長安城之宮闕區域是在城內且與北邊城牆相接連，其證據爲：建春門、金門各爲東、西城壁上唯一的門，貫通此二門的交通幹道將鄴城分爲南、北二部分，宮闕的正南門正面臨此一橫街。這條通貫建春、金門兩門的橫街距北邊城壁有二里半的距離。南北全長五里的鄴城若說自中央以北二里半的範圍皆爲宮闕區域實是令人難以想像的。況且北邊城壁有廣德、廡門的開設，這不外表示宮闕區以北是有市街區的存在，故在交通上有其必要性。這種情形與隋代大興城、唐代長安城之宮闕區域偏北靠近城壁，而北邊城壁上並無重要的大門設立的現象應相互比較審察。至於由宮闕正門端門以外直至鄴城正南門中陽門的幹道兩旁是否允許人民居住，因記錄的不足，故無法確知，但可能是不禁止，若是這樣則與「周禮」匠人及「禮器圖」的說法有若干的差異。

四

其次，討論西晉首都洛陽城之都城範圍與宮闕位置的關係。關於其都城，「晉書」地理志上篇河南郡洛陽條有如下的記述：

洛陽置五部三市。東西七里。南北九里。東有建春東陽清明三門。南有開陽平昌宣陽建陽四門。西有廣陽西明閭闔三門。北有大夏廣莫二門。司隸校尉河南尹及百官列城內也。

此七里、九里的實際長度由於尺度的差異，現在也很難推算出面積的實際大小。但是東西與南北長度的比例是很明顯的，亦由此可知洛陽城是一東西較短、南北較長的都城即一較深的都城。洛陽城於北魏孝文帝大和十七年（西元四九三年）後成爲北魏首都。建都之時除了城壁有些許的擴建、城門名稱有所變更以外，並無大規模的改廢或方位的移動，北魏楊銜之所作「洛陽伽藍記」的序文中提及洛陽城門，記有：

大和十七年。後魏高祖遷都洛陽。詔司空公穆亮。

營造宮室。洛陽城門依魏晉舊名。

對各門名稱的變更沿革也有詳盡的記錄。（表一）

表1 洛陽城門表

名稱沿革 位置	漢代	魏晉時代	北魏時代
東面北頭門	上東門	建春門	建春門
東面中間門	東中門	東陽門	東陽門
東面南頭門	望京門	青明門	青陽門
南面東頭門	開陽門	開陽門	開陽門
南面中間門	平門	平昌門	平昌門
南面西頭門	津門	津陽門	宣陽門
西門南頭門	廣陽門	廣陽門	西明門
西面中間南門	雍門	西明門	西陽門
西面中間北門	上西門	閭闔門	閭闔門
西面北頭門	無	無	承明門
北面西頭門	夏門	大夏門	大夏門
北面東頭門	穀門	廣莫門	廣莫門

由表一可以清楚地看出北魏孝文帝遷都洛陽以來，都城諸門名稱大抵沿用魏晉時代的舊稱，只新設了一個承明門。雖然承明門新闢設於西晉時西面城牆閭闔門的北方，但就都城而言，西邊城壁的位置並未有移動。簡言之，北魏首都洛陽城除了都城範圍以及承明門外，其他十一個門的方位與西晉時代無大變異。關於北魏洛陽城的街衢，「洛陽伽藍記」楊銜之自序中記有：

一門有三道。所謂九軌。

可知洛陽城街衢的規制是取法前述「周禮經圖」中之「王國經緯涂軌圖」式，劃分成九區的中國傳統首都建設計劃原則，並非北魏孝文帝所新創，而其沿襲魏晉時代尤其西晉時首都的舊制，由十一個門的位置未有變動可以證明。雖然從邏輯的觀點而言逆命題不必然為真，但在此情況西晉至北魏十一門位置未有移動，幹道也以此十一門為基準規劃，北魏時的九軌制與西晉時代亦不相違，可以想見西晉洛陽城的規劃也是依照中國傳統首都建設計劃劃分九區的原則制定的，唯都城內宮闕區域的位置是否在城的中央，至今尚未確定。若要討論西晉洛陽城內宮闕區域的位置必先要了解各宮闕門的名稱，不過在「晉書」地理志中對此並無詳細記載，因此無法確知宮闕所在的位置。就北魏楊之的「洛陽伽藍記」序文看來，雖有關於洛陽城十二門的沿革與位置的記載，而可推溯西晉時代的情形，但對於宮闕諸門名稱及位置却無詳記，唯有零星片斷地提到一、兩個門的名稱，根據這些實無法達到本節考證的目的，況且學疏寡聞，對研究西晉洛陽城的專書所知有限，因此未有所得。

所幸北魏酈道元「水經注」中的記述稍能解決此一問題，從有關北魏洛陽城起源的記載，可以追溯了解西晉洛陽城宮闕諸門名稱及其位置，並可對宮闕區域在都城內的位置作更進一層的認識。「水經注」穀水條其注如下：

陽渠水。南盤閶闔門。其水北乘高渠。枝分上下。歷故石橋東入城。逕望先寺。渠水又東歷故金市南。直千秋門。又支流入石運伏流。注靈芝九龍池。其一水自千秋門南流。逕神虎門下。東對雲龍門。又南逕通門掖門西。又南流東轉。逕閶闔門南。渠水又枝分夾路。南出逕太尉司徒兩坊間。謂之銅駝街。渠水又西歷廟社之間。南注南渠。渠水自銅駝街東逕司馬門南。渠水又東逕杜元凱所謂翟泉北。今無水。渠水歷司空府前。逕太倉南。出東陽門石橋下。注陽渠。穀水自閶闔門而南。逕土山東。南出逕西陽門。東對東陽門。穀水又南逕白馬寺東。穀水又南逕平樂觀東。穀水又南逕西明門。門左枝渠東派入城。逕太社前。又東逕太廟南。又東於青陽門右下注陽渠。穀水又南東屈逕津陽門南。穀水又東逕宣陽門南。對閶闔門，南直洛水浮桁。門左即洛陽池處也。池東舊平城門所在矣。今塞北對洛陽南宮。穀水又逕靈臺北。穀水又東逕平昌門南。又逕明堂北。穀水又東逕開陽門南。又東逕國子太學石經北。穀水於城東南隅枝分北注。逕青陽門東

。又北逕東陽門東。又北逕故太倉西。又北入洛陽橋。穀水又東左迤為池。又東右出為方湖。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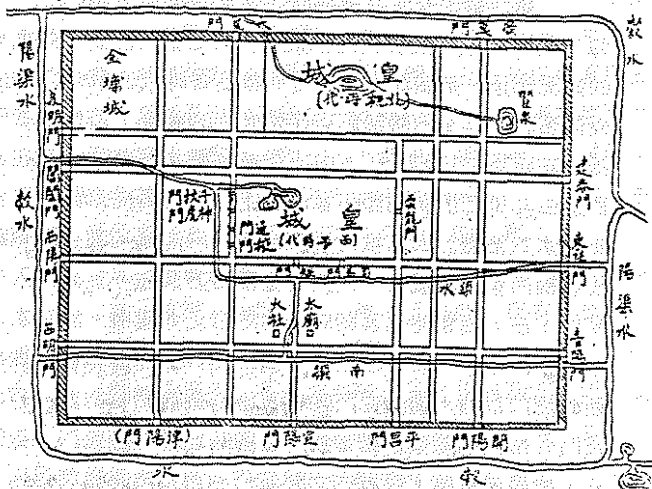
以上是有關穀水及其支流陽渠水在洛陽城周圍及城內流佈的實況記述，熟讀後大體上可明瞭西晉時代宮闕諸門的位置與名稱。其文內將望先寺作瑤光寺的錯誤，前輩學者已提出論證而加以訂正了。由上記載，穀水支流陽渠水在城西邊由北第二門閶闔即西晉時之上西門門外向南流，可知陽渠水於洛陽城西北城角沿西牆外向南流。其支流則經故石橋向東流入城內，流經故金市南方又生一支流流入千秋門，注入西晉時代宮闕區域內的靈芝九龍池。陽渠水之主流則由千秋門以西即西晉宮闕範圍外的西邊都城向南流經神虎門以西。而神虎門即與東邊的雲龍門相對應。經神虎門外南流的陽渠水在都城內宮闕區以西再經通門、掖門外，稍南後東轉，經城內之閶闔門即西晉時的雉門以南東流，於此又生一支流，此支流則向南流經太尉坊、司徒坊俗稱銅駝街，再注入介於東側太廟與西側太社之間的南渠。由此可知太廟位於雉門前正南街道之東，太社則在街道之西。經過雉門前的主流更經司馬門南邊而東流，再經翟泉之北，太倉之南，於東陽門（西晉時亦稱東陽門）之石橋下流出洛陽東城外。

以上的說明，我們可以得知西晉時的宮闕區域西面有四個門，自北而南為千秋門、神虎門、通門、掖門，東西則有雲龍門，南面靠西為雉門，靠東為司馬門；雉門門前南北行走街道是為宮闕前的御道。

上文所引的「水經注」又意味着西晉時洛陽城西牆最北的閶闔門即北魏時洛陽西牆自北之第二門亦稱閶闔門，由此門外南流的穀水流過西陽門（西晉時稱西明門）外西邊南下，再經西明門（西晉時稱廣陽門）的西邊，而於洛陽城西南角東轉，經宣陽門（西晉時稱津陽門）以南地方東流，流經平昌門（西晉時亦稱平昌門）及開陽門（西晉時名稱同）外。其支流則於洛陽城東南角外向北流，也就是由東城牆外向北流，流經東方三門：青陽門（即西晉時的青明門）、東陽門（西晉時名稱相同）及建春門（西晉時名稱亦同）；至城東北角外西轉，與由西流經洛陽城北城牆的大夏門（西晉時名稱相同）、廣莫門（西晉時名稱亦同）二門外而東來的穀水相會合。

按照以上的記述可知西晉時的閶闔門原在西城牆之北上方，但並非在最北端的位置，北魏時代在此門與都城西北角之門偏南的地方新設了承明門，這個門的位置即是位於西牆中央稍北處，而由閶闔門旁邊東流入城的渠水，其由西晉之宮闕地區西面最北的千秋門北邊流入宮闕區，可見宮闕區是在包括閶闔門在內的東西橫綫以南的範圍內

圖3 水經注所載西晉北魏洛陽城都市計劃略合圖



由「水經注所載西晉北魏洛陽城都市計劃略合圖」（圖3）上所示可看出西晉時代的宮闕區域的位置大致在洛陽城的中心部分。

從「水經注」穀水條的記載我們可以察知西晉洛陽城的宮闕區大略在城的中心部位，雉門前南通的御道東為太廟，西為太社之所在，配合楊衍之「洛陽伽藍記」的自序，亦可知城內街道是成九軌棋盤式，就是說西晉首都洛陽城的規劃也是依照傳統前朝後市，左祖右社，中央宮闕、左右民廛的原則設計的。清代楊守敬「水經注圖」卷尾所示之「洛陽城圖」大致在上文中可獲妥當的詮釋，而此圖又與道光甲午年新刻「洛陽伽藍記」卷首的「洛陽伽藍記圖」大體相同。

五

再就時代較後的北宋東京開封府討論，「宋史」卷八十五地理志中記有：

東京。汴之開封也。梁為東都。後唐罷。晉復為東京。宋因周之舊為都。建隆三年廣皇城東北隅。命有司畫洛陽宮殿。按圖修之。皇居始壯麗矣。雍熙三年欲廣宮城。詔殿前指揮使劉延翰等經度之。以居民多不欲徙遂罷。宮城。周迴五里。南三門。中曰乾元。東曰左掖。西曰右掖。東西面門曰東華西華。北一門曰拱宸。

舊城。周迴二十里一百五十五步。東二門。北曰望春（初名和政）。南曰麗景。南面三門。中曰朱雀。東曰保康（大中祥符五年創建）。西曰崇明。西二門。南曰宣秋。北曰閭闔。北三門。中曰景龍。東曰安遠。西曰天波。（以上宋初仍梁晉舊名。至太平興國四

年改今名）。

新城。周迴五十里六十五步（大中祥符九年增築。元豐元年重修。政和六年詔有司度國之南。展築京城。移置官司軍營。舊城周四十八里二百三十三步。周顯德三年築）。南三門。中曰南薰。東曰宣化。西曰安上。東二門。南曰朝陽。北曰含輝（太平興國四年改寅賓後復）。西二門。南曰順大。北曰金輝。北四門。中曰通天。東曰長景。次東曰永泰。西曰安肅。

這些門時有改廢，其名稱在「宋史」地理志的注裏多有記載，且常是改稱與俗稱並具。北宋末南宋初孟元老對於北宋末期的情形曾作紀錄。在其「東京夢華錄」卷一東都外城條有如下的記述：

東都外城。方圓四十餘里。……城門皆疊城三層。屈曲開門。唯南薰門新鄭門新宋門封丘門皆直門兩重。蓋此係四正門皆留御路故也。新城南壁其門有三。正南門曰南薰門。城南一邊東南則陳州門。傍有蔡河水門。西南則戴樓門。傍亦有蔡河水門。……東城一邊。其門有四。東南曰東水門。乃汴河下流水門也。……次則曰新宋門。次曰新曹門。又次曰東北水門。乃五丈河之水門也。西城一邊。其門有四。從南曰新鄭門。次曰西水門。汴河上水門也。次曰萬勝門。又次曰固子門。又次曰西北水門。乃金水河水門也。北城一邊。其門有四。從東曰陳橋門。次曰封丘門。次曰新酸棗門。次曰衛州門。

其中陳州門即「宋史」地理志的宣化門，戴樓門即安上門，新鄭門即順大門，固子門即金輝門，新酸棗門即通天門，封丘門即長景門，陳橋門即永泰門，衛州門即安肅門，新宋門即朝陽門，新曹門即含輝門，南薰門則名稱始終未改變。

又「東京夢華錄」卷一、舊京城條記有：

舊京城。方圓約二十里許。南壁其門有三。正南曰朱雀門。左曰保康門。右曰新門。東壁其門有三。從南汴河南岸角門子。河北岸曰舊宋門。次曰舊曹門。西壁其門有三。從南曰舊鄭門。次汴河北岸角門子。次曰梁門。北壁其門有三。從東曰舊封丘門。次曰景龍門。次曰金水門。

其中新門即「宋史」地理志中的崇明門，舊宋門即麗景門，舊曹門即望春門，舊鄭門即宣秋門，梁門即閭闔門，舊封丘門即安遠門，金水門即天波門，景龍、朱雀、保康三門則與「宋史」地理志名稱相同。

又「東京夢華錄」卷一、大內條：

大內正門宣德樓。列五門。……入宣德樓正門。乃大慶殿。……宣德樓左曰左掖門。右曰右掖門。……文德殿(常朝殿也)。殿前東西大街。東出東華門。西出西華門。……後門曰拱辰門。

其中宣德樓正門即「宋史」地理志所載的乾元門，根據「宋史」地理志乾元門在宋初沿用五代梁晉時的舊名稱爲明德門，太宗太平興國三年(西元九八七年)以後改稱爲丹鳳門，眞宗大中祥符八年(西元一〇一五年)再改稱正陽門，仁宗明道二年(西元一〇三三年)以後則稱宣德門，唯在太宗雍熙元年(西元九八三年)時一度曾稱乾元門。以上概略地說明了北宋東京內外二城各個門的名稱及其明確的位置，因爲這些對於本文的討論極爲重要，故不厭其煩地一一詳述。

有關北宋東京城的研究，清代周城「宋東京考」及明代李濂「汴京遺蹟考」皆以東京的大內區大致等於唐代宣武郡節度使的舊治區。而舊城(即內城)的城壁是唐德宗建中二年(西元七八一年)時節度使李勉所築造的，此城壁乃淵源於古時的關城也稱作裏城，當外城改建成新城後，與之相對遂以舊城作爲內城的專稱。外城(即新城)是後周世宗顯德三年(西元九五六年)時增建或稱羅城而相對於內城之改稱舊城故又稱爲新城。五代時後梁、後晉、後漢各朝皆建都於此，但此時之開封府城只是一重城牆，及至後周顯德三年三月以後才有二重城壁，而有內城、外城的形成。北宋東京根據此二重城壁的都城以內城以及外城以內城周圍的地方作爲大內的所在。「宋史」地理志關於新城的記載其注中記有舊城周長四十八里二百三十三步，但其所指的舊城並非內城的舊城而是後周時外城的新城，北宋時略加拓建的外城新城是爲新的新城，因此後周時代的新城是舊的新城，簡稱舊城。

根據以上的說法，外城的正南門南薰門與內城的正南門朱雀門，以及大內的正南門乾元門(即丹鳳門或稱宣德樓正門)三門的位置是同在一南北直綫即向南的御道上，由孟元老「東京夢華錄」卷一，東都外城、舊京城、大內諸條綜合亦可知南薰門、朱雀門及宣德樓正門三門是由南北向的御道所貫通，明代李濂的「汴京遺蹟志」引用楊奐的「汴故宮記」記有：

皇城南外門曰南薰。南薰之北新城門曰豐宜。橋曰龍津。橋北曰丹鳳而其門三。丹鳳北曰州橋。橋北曰文武樓。避御路而北橫街也。東曰太廟。西曰郊社。正北曰承天門。

依此記載南薰、豐宜、丹鳳諸門及州橋、承天門都由一南

北貫通的街道所串連。丹鳳門即指「宋史」地理志中的乾元門，在此之前已說明。關於這條御道的形勢，「東京夢華錄」卷二御街條記有：

坊巷御街自宣德樓一直南去。約濶二百餘步。兩邊乃御廊。舊許市人買賣於其間。自政和間。官司禁止。各安立黑漆杈子。路心又安朱漆杈子兩行。中心御道不得人馬行往。行人皆在廊下朱杈子之外。杈子裏有磚石甃砌。御溝水兩道。宣和間盡植蓮荷。近岸植桃李梨杏。雜花相間。春夏之間。望之如繡。

由前述各項記載，都可看出北京東都的宮城皇城區域是在內城中央及其以南的部位，而內城的都市規劃是與「周禮」匠人及「欽定禮記義疏」附錄的「禮器圖」卷一，關於朝市塵里的記載相合。這就是說中國傳統首都建設計劃的構想：左祖右社、前朝後市、中央宮闕、左右民塵的原則在此表露無遺了。

六

以下討論元大都燕京(汗八里)，這個都城的南面城壁，即在今北平內城城內東西向的東西長安街北端的位置，證據是因西長安街北爲雙塔寺、觀象台、貢院，及都城隍之所在。

雙塔寺是大興隆寺的俗稱，明代時稱作大慈恩寺，而在元代時另一稱呼爲大慶壽寺，是金章宗時所建的名刹。該寺自金代建立以來曾遭數次火災，雖然殿宇有所改變，但所在位置則至今未有遷移。至於一般所謂的雙塔，明末劉侗、于奕正所編的「帝京景物略」卷四、西城內雙塔寺條記述其一是爲佛日圓照大禪師可菴所建的七層塔，另一則是爲通元廣慧大禪師海雲所建的九層塔。清代于敏中等合編的「欽定日下舊聞考」卷三十八，京師總記條引「元一統志」「析津志」記有：

元城京師。有司定基。正直慶壽寺海雲可菴二師塔。勅命遠三十步許。環而築之。

而現今西長安街雙塔的情形，根據西元一九二八年九月四日實地的勘察，得知西長安街是在大柵欄東南交叉角、頭條胡同之南，街北地區舊日的美好景象已化爲烏有，只有一些門像廟宇的小門的照像館、鐵片廠遺留在此。越過此地，則雙塔屹立在北邊，從距西長安街街路北端二十四、五尺的地方望去，雙塔的高度十分之七突出在鐵片廠的屋頂上，在西長安街上是看得見的。雙塔的塔基是與鐵片廠的廚房相連，而二塔大致南北相接並列，南側爲七層的可菴禪師塔，北側爲九層的海雲禪師塔。雙塔皆是實心

塔，所以無法攀登，雖是用泥土、黃土建成，顏色却似水泥，而且模仿木造建築的手法，層簷的構造相當巧妙，都是六角簷，簷端所掛的風鈴也都古色古香。此雙塔確是元代大慶壽寺的遺存。元世祖忽必略在經營大都時，以其為南面城牆計劃綫上的一項障礙物，所以特令將南面城牆向南作約三十步的擴張，可見元大都燕京的南面城牆當是在今日西長安街北的東西向沿綫，且在雙塔寺前向南有三十步許的凸出，成一弧形。

觀象台在「元史」天文志的記載：

至元十六年。建司天台于大都。儀像圭表。皆銅爲之。

至正十六年（西元一二七九年）即蒙古攻打日本的前兩年，由郭守敬所計劃設立的。元代觀象台的位置與今無異，故無再討論的必要。現今的位置是在北平內東城棧背胡同東部突出的地方，而靠近內城的東南城牆。依據「欽定日下舊聞考」卷四十六、城市、內城、東城二條，所引元吳師道「吳禮部集」中的「九月二十三日城外紀遊作」一詩記述：

杪秋暇日口弦歌。五門城外觀新河。斗門泱水已數日。淺沙漫漫口餘波。縱橫疏鑿引別派。監官督役猶揮詞。循堤側足懼疏惡。驚見崩折當盤渦。故橋舊市不復識。祇有積土高坡陀。城南靡靡度阡陌。疎柳掩映連枯荷。清台突兀出天半。金光耀日如新磨。璇衡遺製此其的。衆環倚植森交柯。細書深刻皇祐字。觀者歎息爭摩挲。司天貴重幸不毀。回首荆棘悲銅駝。長春宮苑最宏麗。飛樓湧殿凌層坡。云云

詩中所謂的清台，即是指觀象台，「金光耀日如新磨」，則是在讚頌青銅製的天文儀器，由此可知元代觀象台即今所在的位置，也確位於當時元大都燕京的東南城外；而現今觀象台的北方，就是大都燕京東西橫行的南城牆的所在地了。

至於貢院，明代孫承澤的「春明夢餘錄」卷四十一、禮部三、貢院條，對其位置與沿革有所說明：

貢院在城東南隅。元禮部舊基也。永樂乙未改爲貢院。制甚偏隘。嘉靖中議改創西北隙地。又有言。東方人文所會。宜因其趾而充拓之。卒未果。至高禱二年始命工部重建。因故趾。拓旁近地益之。徑廣百六十丈。外爲崇墉。

而今日北平內城的東南隅，東爲松貴胡同，北爲東總布胡同，南爲水磨胡同，西爲福建司營所圍，貢院的舊址就是在元代禮部的舊基，而元代的禮部是在燕京都城內東南隅

，因此，元大都燕京的南城牆，當在今日貢院遺址以南的東西沿綫上。

城隍廟現存於北平內城西城臥佛寺街以北的都城隍街。此廟的創立是在元世祖至元七年（西元一二七〇年），「欽定日下舊聞考」卷五十、城市、內城、西城一條，引用元代虞集之「大都城隍廟碑」文：

世祖聖德神功文武皇帝至元四年。歲在丁卯。以正月丁未之吉。始城大都。立朝廷宗廟社稷官府庫庾。以居兆民。辨方正位。井井有序。以爲子孫萬世帝王之業。七年太保臣劉秉忠。大都留守臣段貞。侍儀奉御臣和坦伊蘇。禮部侍郎臣趙秉溫言。大都城既成。宜有明神主之。請立城隍神廟。上然之。命擇地建廟。如其言。得吉兆於城西南隅。建城隍之廟。設像而祀之。封曰佑聖王。以道士段志祥築宮其旁。世守護之。自內廷至於百官庶人。水旱疾疫之禱。莫不宗禮之。邇來六十有餘年。國家治平。民物繁阜。日盛一日。而神之所依亦厚矣。

同書同條又引元翰林院兼國史院從事韓從政於元貞元年（西元一二九五年）所作的「佑聖王靈應碑序」一文：

大元有天下。建大都。立宗廟。安社稷。懷柔百神。凡在祀典者。朝命通祀。殷薦豐腆。春夏不闕。至元初。選都之坤方一隅。命少府督工。創建城隍廟。不日落成。丹青盡飾。壯如王者之居。云云可知都城隍廟是位於大都燕京都城的坤方（未申隅）即西南角的位置。自元代創建以來，雖歷明宣宗宣德五年（西元一四三〇年）、英宗正統十二年（西元一四四七年）、世宗嘉靖二十七年（西元一五四八年）及清世宗雍正四年（西元一七二六年）、高宗乾隆二十八年（西元一七六三年）的重建，但位置大致未變，因此現今都城隍廟的西南地方，應當就是元大都燕京的都城西南角的所在地了。

根據以上的四項考據，可知元大都燕京都城的西南城牆，西起今日北平內城西城之臥佛寺街、舊刑部街一綫以南邱祖胡同、報子街一綫以北，而距前者較近，經雙塔寺以東即今總統府正門新華門的位置，過東西南長安街北側、北門南側，向東延伸，再經東單牌樓北方、內城東城的觀音寺胡同以北棲鳳樓胡同以南，通過貢院舊基的南部，東至驢蹄胡同的南方。大都燕京南城牆的正南門麗正門，即在今日天安門前百石橋的最西端；在西長安門北邊的是南城壁東端的文明門，此門在現今東單牌樓的東北方，觀音寺胡同、棲鳳樓胡同與火神廟胡同的交會點的西南。一一以往一般的說法，都認爲此門是在今日東單牌樓的地點，但從元代燕京都城的坊制看來，則文明門的位置，不應在此

——南城壁西端的順承門，位於現在西單牌樓西北，舊刑部街與北開市口的交會處——以往的說法認為此門是在西單牌樓的位置，但考之坊制，可知並非如此——至於近來在北平王府大街之南霞公府南側、北京飯店所在的北邊，有元代俗稱土城的古土阜遺址發現的問題，在此也可以附帶地解決，依照上述的理由，霞公府南邊是大都燕京都城南牆的擬定地點，所以以霞公府為元城遺址，應是不失其真。

元大都燕京都城北面城牆的位置，迄今已無太大的爭論，因為其土城遺址的存在，較諸其他言詞的論辯來得有力。現在北平內城，德勝門外五里、安定門外五里的地方，即是土城遺址東西橫綫的所在。而元大都的宮闕位置，元末陶宗儀「輟耕錄」下篇，宮闕制度條記有：

大內。南臨麗正門。正衙曰大明殿。曰延春閣。宮城周圍九里三十步。東西四百八十步。南北六百十五步。高三十五尺。……分六門。正南曰崇天。十二間五門。東西一百八十七尺。深五十五尺。高八十五尺。左右趨樓二。……崇天之左曰星拱。……崇天之右曰雲從。……東曰東華。西曰西華。……北曰厚載。五間一門。

元大內的正南門為崇天門，正北門為厚載門，東門為東華門，西門為西華門。崇天門與都城正南的麗正門隔着長約七百步的千步廊遙相對應。關於厚載門，曾見元故宮的明代蕭在其「故宮遺錄」中有下述的記載：

又後為厚載門。上建高閣。環以飛橋。舞台。於前回闌引翼。每幸閣上天魔歌舞於台。繁吹導之。自飛橋而升。市人聞之。如在霄漢。臺東百步有觀星台。台旁有雪柳萬株甚雅。台西為內浴室。有小殿在前。由浴室西出內城臨海子。海廣可五六里。駕飛橋於海中。西渡半起瀛洲圓殿。繞為石城圍門。散作洲島。拱門以便龍舟往來。由瀛洲殿後北。引長橋上萬歲山。高可數十丈。皆崇奇石。因形勢為巖岳。前拱石門三座。面直瀛洲。東臨太液池。西北皆俯瞰海子。由三門分道東西而升。下有故殿基。金主圍棋石台壺。山半有方壺殿。

此萬歲山下金代宮殿舊址，即是「金史」地理志中所謂城北離宮的大寧宮址之所在，其境內瓊華島的巖石，根據清代高士奇「金瓶退食筆記」卷六中所記，是金人從北宋開封府徽宗的艮岳中移來的。陶宗儀「輟耕錄」上篇，萬歲山條曰：

萬歲山。在大內西北太液池之陽。金人名瓊華島。中統三年修繕之。其山皆以玲瓏石壘疊。峰巒隱映

。松檜隆鬱。秀若天成。

「故宮遺錄」中所見的海子即是北海，因此厚載門的位置是在今日景山壽星殿以北，而元代宮闕區域的西北隅便與現今北平皇城區域相當，東北隅也大致相合。所以元代宮闕區域大致和今紫禁城的範圍相同，唯其位置可能稍偏西北。元代大都南、北城牆的位置，大抵如上所論；而其東、西城牆位置，相當於明清時代的北京城，即現在的北平內城東西城牆的所在。至於宮闕區域的位置則存在於中心偏南的部位。

「欽定日下舊聞考」卷三十八、京城總記條，引用「元一統志」元代虞集對大都五十個坊的命名記載，其中關於穆清坊有如下的記述：

穆清坊。地近太廟。取毛詩於穆清廟之義以名。穆清坊的位置是在齊化門（現為朝陽門）大街以南、文明門大街以東、九條通以北、都城東牆以西的地方。這個坊北側隔齊化門大街為寅賓坊，是元太廟的所在。朝南的太廟大門正臨齊化大街，相當於現在朝陽門內路以北，亦即位於元代宮闕區域的左方（東側）。

「元史」卷七十六、志第二十七上、祭祀五、太社太稷條曰：

至元七年十二月。有詔歲祀太社太稷。三十年正月。始用御史中丞崔或言。於和義門內少南。得地四十畝。為壇垣。近南為二壇。壇高五尺。方廣十之。社東。稷西。相去約五丈。

可知元代社稷壇是在和義門內路之南，和義門即今北平西直門。就元代都城位置而言，社稷壇是在宮闕區域的西邊稍北的地方。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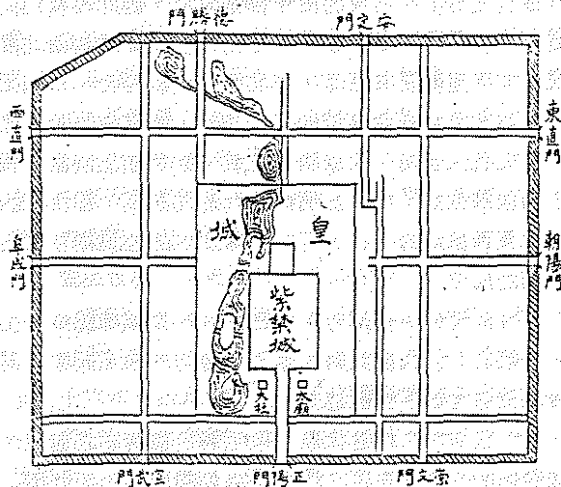
從以上的史料中，我們可以明白元代大都燕京的都市計劃，依然採用了中國首都建設計劃中前朝後市、左祖右社、中央宮闕、左右民廛的傳統原則。

就明太祖所營建的金陵來看，是有若干的變化。其中宮闕區域是在金陵城內偏東的位置；詳細情形參考「洪武京城圖志」、「金陵古今圖考」之「國朝都城圖考」條，可知社稷壇是在端門的右邊，太廟在端門左邊；而在都城正門正陽門及皇城正門洪武門之間，無市街的存在。雖有這些的變異，但仍不失前朝後市、左祖右社、中央宮闕、左右民廛的原則，唯缺乏後市與左民廛而已。「明史」卷五十一、禮志五、廟制條記有：

宗廟之制。明初作四親廟於宮城東南。……或祖遷都。建廟如南京制。

至於明成祖以後首都北京城的都市計劃，在「明史」地理志、順天府條，對宮闕建設有以下的記述：

圖4 明清首都北京城都市計劃略圖



永樂四年閏七月。建北京宮殿。修城垣。十九年正月告成。宮城周六里一十六步。亦曰紫禁城。門八。正南第一重曰承天。第二重曰端門。第三重曰午門。東曰東華。西曰西華。北曰元武。

清代的紫禁城，幾乎全襲自明代，明清時代北京城的都市計劃在今北平仍可見大概；其沿用傳統首都建設計劃的規制，由實際勘察北平內城中紫禁城、社稷壇、太廟等位置，可得到印證。「明清首都北京城都市計劃略圖」（圖4）所示太廟，在午門東南端門之東，至今尚可見其遺跡；社稷壇在午門的西南端之西，為今中央公園之所在。

七

前朝後市、左祖右社、中央宮闕、左右民廛，這種的都市計劃，在周朝東都雒邑營建時已被實行，只是並沒有關於雒邑的確切史料留存下來，所以在此不予討論。其他除了西漢首都長安城，以及其他未知或例外的現象以外，根據上述的說明，魏都鄴城、西晉洛陽、北宋東京開封府、元大都燕京、明金陵以及明清的北京城等歷代的名都，無一不是根據此一傳統的首都建設計劃來營建規劃的。固然還有其他不同的說法，但依作者個人的看法，五胡時代前後燕首都薊城、金海陵王以後的首都中都大興府等，也都是依照這種首都建設計劃的原則慣例來營建都城的。

但唐代長安城（即隋大興城），與傳統首都建設計劃的原則，相違之處甚多，就其規劃而言，實為中國歷代首都中的一項特例。由「隋大興城都市計劃略圖」（圖5）簡單的圖示中可知：

(一)宮城皇城區域位於中央以北，與中央宮闕的慣例相

違背。

(二)宮城皇城區域的北部，與城壁相連接，宮闕區域以北並無市街存在的空間，此與後市的慣例則相違。

(三)宮城皇城區域前朱雀門大街的兩側，各有九個坊，合計十八坊；而朱雀門大街街東第一街與街西第一街又各有九坊，合計十八坊；在宮城皇城的南方，總共有三十六個坊，劃定為臣庶的住宅區。宮闕前方至都城以內地區，允許官員、庶民居住，這與左右民廛的原則不合。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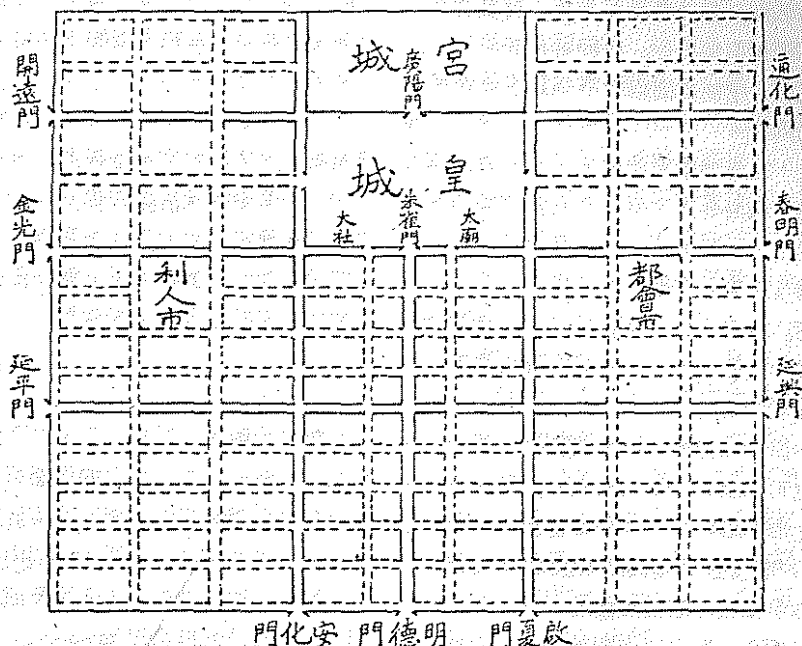
(四)雖然仍採左祖右社的形式，但都位於皇城之內，安上門內以東為太廟，含光門內以西為太社，與後世首都規劃的慣例有所差異。這點在本文的討論中雖非重要問題，但從整個都城觀察而言，也是與一般原則相違背的地方。

以上所提出的各點，(一)至(三)項可說是比較特殊的現象。我們不能只認為它是傳統首都營建計劃的一種變形而已，其間必有其所以然的原因存在的。

有關隋代大興城即唐代長安城的體制，中外有許多學者作過研究。宋朝宋敏求的「長安志」，元朝李好文「長安志圖」、清朝徐松的「唐兩京城坊考」、以及「嘉慶重修咸寧縣志」、「長安縣志」等，是研究坊制與史蹟的；法國人 Henri Havret 在「西安府的耶穌教碑」（La Stèle Chrétienne de Si-Ngan-Fou. 1895.

Chang-Hai. Variétés Sinologiques No. 7）的研究中，於第一〇七頁至一三一頁，根據「咸寧縣志」，並繪「唐代長安城圖」（Tch'ang-Ngan sous les Tang.）和「唐城今城合圖」（Si-Ngan-Fou moderne et l'antique Tch'ang-Ngan），討論長安坊制的復原，以及與當今西安府城疆域的關係，但對於我們所關切的都市計劃問題却未提及。宋代張禮的「遊城南記」與明代趙頤的「遊城南記」，主要在研究史蹟的位置。法國人 E. Chavannes 所作的「中國遺蹟遺物圖錄」（Mission Archeologique de la Chine）與 Segalen 的「中國遺蹟遺物圖錄」（Mission Archeologique en Chine）皆為有關唐代長安史蹟遺物的寶貴圖錄，但對本文的議題並無直接的參考價值。最近的研究成果刊於一九一九年燕京大學歷史學會出版的「史學年報」第一期，瞿兌之所作的「以日本平安京證唐代西京之規制」，是參考一九一八年十一月日本伊東忠太博士在「科學知識雜誌」所發表關於日本平安京的研究，再與宋敏求「長安志」的記載相互稽審而寫成的，並非特別值得注意的論文，且對我們所研究的問題未加討論。因此，就個人所知，目前無

圖5 隋大興城都市計劃略圖



論日本的東洋學者或中國學者，都尚未有對此種問題的研究報告發表。若牽強地加以解析，則可見之於元代李好文之「長安志圖」卷上、皇城條：

自兩漢以後。都城並有人家在宮闕之間。隋文帝以為不便於事。於是皇城之內。惟列府寺。不使雜居。公私有辨。風俗整齊。實隋文之新意也。

但也不過指出隋文帝營建大興城時，不許皇城區內有民居的存在，是一項新意，至於另一層重要的歷史現象，如宮城皇城在都城內的位置與傳統的規制不同，而都會市與利人市的位置也與前朝後市的古制相違，這些令人注目的問題，則在文中毫無討論。在此情況下，從中國首都建設的都市計劃史上來觀察、批判隋代大興城、唐代長安城，實是一項新的嘗試，個人才學疏淺，不敢妄自揣測，唯提出以下的問題，略加申述，(甲)、表現在隋代大興城的都市規劃，其產生的原因為何？(乙)、如此規劃的首都都市計劃，就中國首都規制史而言，是進步或是退步的現象？但望博雅諸賢不吝指教。

在本文第二節中，我們會肯定隋文帝對首都計劃必抱有某種理想，而加以計劃實行。第三節中，也談到若只由參與營建新都的大臣，共同的協議，未必真能完成這樣的一個中國史無前例的首都建設計劃；反之，隋文帝營建大

興城，主要仍是參照前朝後市、左祖右社、中央宮闕、左右民廛的傳統原則，只不過其間更加入了一些新的改革。這種對傳統首都計劃加以修正的新方法，究竟是誰提出來的？對一向以中華文物為傲，而且性格保守的中國人而言，較難做到，應當是出自能對中國文化採取客觀批評態度者的構想。宋代宋敏求的「長安志」卷六、宮室四、唐上之規部章，列舉了參與新都營建的主要人物：

京城即隋文帝開皇二年。自故都徙。其地在漢故城之東南。屬杜縣。周之京兆郡萬年縣界。南侵終南山子午谷。北據渭水。東臨灊澗。西枕龍首原。命左僕射高穎總領其事。太子左庶子宇文愷規制規模。將作大匠劉龍。工部尚書鉅鹿郡公賀樓子幹。工部尚書鉅鹿郡公賀樓子幹。大府少卿高龍義。並充使營建。

從這項記載中，可知營建新都都是由高穎主其事，太子左庶子宇文愷總掌都市計劃，將作大匠劉龍、工部尚書鉅鹿郡公賀樓子幹、大府少卿高龍義三人也都參與其事。這些建設單位中以都市計劃部門為首腦，因此宇文愷對於整個計劃的意見，必然最值得重視了。此外，在這五位主要人物中，非純粹的漢人有三人，這點頗值注意。

由「隋書」卷四十一、列傳第六，高穎傳中可以知道

，他的父親曾仕於北齊、北周，而他的夫人則是胡人賀樓氏，其文如左：

高頴字昭玄。一名敏。自云渤海蓊人也。父賓背齊歸周。大司馬獨孤信引爲寮佐。賜姓獨孤氏。

其夫人賀拔氏寢疾。中使顧問絡繹不絕。上親幸其第。賜錢百萬絹萬匹。

高頴家族是否出於胡族，本傳中未有記載，但他的妻子確爲胡人，而他本人雖說是渤海蓊人，但或許出於胡族也未可知。又「隋書」卷五十三、列傳第十八、賀婁子幹傳（賀婁「長安志」作賀樓），對其家世的記述爲：

賀婁子幹字萬壽。本代人也。隨魏氏南遷。世居關右。祖道成魏侍中太子大傅。父景賢右衛大將軍。子幹少以驍武知名。

是隨北魏孝文帝移居中原的北方部族，原居於代，即今日河北省宣化府，所以也可明瞭是一胡人家族，尤其自其姓氏賀婁看來更是明顯。而他的祖父、父親都曾仕於北魏，並擔任相當高的職位，可以想見他們的家族是受雜糅的胡漢文化所影響。至於宇文愷的家世在他的本傳中並沒有記載，但在「隋書」卷四十、列傳五中對他的兄長宇文忻有如下的記載：

宇文忻字仲樂。本朔方人。徙京兆。祖莫豆于魏安平公。父貴周大司馬許國公。

由此引文，可知其爲胡人；而且這個姓氏原來自鮮卑之拓跋、慕容、宇文、段、秃髮、乞伏等部族的一支。「隋書」卷六十八、列傳三十三、宇文愷傳曰：

宇文愷字安樂。相國公忻之弟也。在周以功臣子。年三歲賜爵雙泉伯。七歲進封安平郡公。邑二千戶。愷少有器局。家世武將。諸兄並以弓馬自達。愷獨好學。博覽書記。……煬帝卽位。遷都洛陽。以愷爲營東都副監。尋遷將作大匠。

而隋代興建明堂時，多以他的研究做爲設計的主體：

自永嘉之亂。明堂廢絕。隋有天下。將復古制。議者紛然。皆不能決。愷博考群籍。奏明堂議。

這點在「東都圖記」二十卷、「明堂圖議」二卷、「釋疑」一卷中都有記載；而關於大興城的營建，則有以下的記述：

及遷都。上以愷有巧思。詔領營新都副監。高頴雖總大綱。凡所規畫。皆出於愷。

由是可知大興城首都計劃的構想大抵出自宇文愷，同時宇文愷對於中國歷代的首都建設計劃，有通盤而深入的了解，熟知其長處與短處，因而能截長補短，而制定出新的方案，他的「明堂奏議」更可證明他對歷史確有極其充分的

認識與研究。由此觀之，前文所提出的隋大興城的首都建設與傳統首都建設計劃相異的三點，當是出自高頴，賀婁子幹、宇文愷等不盲從中國文化傳統的胡人，所做的積極改革。尤其主持首都規劃的宇文愷，他的多方思慮與參與，更是功不可沒。

隋代的皇室是北周的外戚，因此對北方胡人文化，甚爲熟悉，而任用的官員也很多出自胡族，這點可從觀察「隋書」列傳中的姓氏而得證。隋代的各項措施，並不墨守成規盲從傳統，參考隋代在官制上新制的設立，便可明白大興城有如此的營建革新，實在是一種自然的趨勢；而宇文愷的改革計劃方案之能夠實行，也就不足爲奇了。

八

隋代大興城的營建計劃，並不能說是宇文愷一人的獨創構想。個人認爲宇文愷的構想應有其根源。這一根源，應當就是北魏首都洛陽城的都市計劃；而這項計劃，可能也是出自於像宇文愷這樣不盲從中國文化傳統的胡人手中，試圖對中國自古以來的都市建設計劃，加以改革修正，而首先試行於北魏洛陽城。

北魏首都洛陽城是襲用西晉首都洛陽城，加以擴建完成的。依照北魏楊衒之的「洛陽伽藍記」序文中的說法，除新設的承明門以外，其他十一門的名稱都沿用西晉時的稱呼。這點在本文第四節已討論過了。至於在東西七里、南北九里的西晉洛陽城中，宮闕區域的位置，我們可由北魏酈道元「水經注」穀水條文中得到說明，大致位於都城的核心部位；整個都城也是按照也是根據前朝後市、左祖右社、中央宮闕、左右民廛的傳統原則規劃的。大和十七年（西元四九二年）北魏孝文帝定都於西晉洛陽時，在商討如何修建之初，都城仍是西晉時的東西七里、南北九里，但「洛陽伽藍記」卷五、卷尾記有：

京師東西二十里。南北十五里。戶十萬九千餘。廟社宮室府曹以外。方三百步。爲一里。里開四門。門置里正二人。吏四人。門士八人。合有二百二十里。

這些數值大小的差異，並非由於西晉、北魏所用的尺度不同，而是因北魏時對洛陽城加以擴建所產生的。西晉時的十一門，北魏時也如數地將之移至新城牆上，東三門、北二門、南三門，唯獨西面除原有的三門外，增設了承明門。宮闕乃是任命司空公穆亮加以新建的，新建的宮室，位於西晉宮闕區域以北，因此，整個宮闕區域北端，與北城牆相銜接着。「洛陽伽藍記」序文中，對北二門的記載可做爲證據：

北面有二門。西頭曰大夏門。……東頭曰廣莫門。……廣莫門以西。至於大夏門。宮觀相連。被諸城上也。

也就是說，北魏洛陽城的宮闕區域，是位於城內中央以北偏東的部分，而在北面城牆，甚至有宮觀樓台的突出。因此北魏洛陽城可以說是：

- (一)與隋大興城同樣違背了中央宮闕的原則。
- (二)與隋大興城同是宮闕區域與北面城牆相連，其間並無任何市區的存在，此與後市的慣例相背馳。
- (三)與隋大興城同樣地在宮闕區域前南方，有官吏庶民區的規劃；宮闕前方允許官員庶民住屋的存在，與左右民廛的慣例違背。

以上三點可參見圖二「水經注所載西晉北魏洛陽城都市計劃略合圖」。在討論這些現象的原由之前，若能先對北魏舊都平城的都市計劃，作一番了解，當更可增加研究的趣味，可惜這方面未有詳細記錄的流傳。「大清一統志」卷一〇九、山西省大同府古蹟條，以平城題記有：

在大同縣東。……城邑考今大同城東五里無憂陂上。有平城外郭。南北宛然。相傳後魏時故址。

由此可知，平城遺址現在仍有部分的遺存，如果能實地的去勘察，對其都市的規劃必能有更進一步的認識。但到目前為止，尚未有人做過這樣的嘗試。因此也就缺乏詳細調查報告的發表。至今有關平城的都市規劃情形，無論文獻或勘察報告，資料都很缺乏，實為一大憾事。在這種情況下，這方面的問題只好暫予保留。而就已知資料，探討北魏洛陽城的規劃之所以未依照中國傳統首都建設計劃實施的直接原因。其中主要的因素，在於北魏胡人中的有識之士，能以批判不盲從的態度觀察中國的文化傳統，而取其長處補其所短；北魏洛陽城的規劃即是一個具體的例子。北朝的胡族世系，較南朝的人更有踏實的民族性，不重表面而講求實際的作風較為強烈。由雙方研究經學的態度，可以為證，「隋書」儒林傳記：

南人約簡得其英華。北學深蕪窮其枝葉。

清代王鳴盛「蛾術篇」卷二、說錄：中對南北朝風氣作了以下的比較：

南人輕浮淺躁。北人沈潛篤實。南人虛夸誕妄。北人誠樸謙謹。故學尚不同。

由以上的評語看來，北方人較具踏實的性格，也因此較富有實踐性。例如均田法的實施，北魏政府便做得較為徹底。而其之能不拘泥於中國傳統首都建設計劃的原則，而新創制定出一項在中國歷代首都未曾有的都市規劃，並大膽地實行，這即是由其認真而重實踐的性格所使然。這種新

制施行的目的，以下將再作論述；從實行的情形看來，應當是由對實際生活的重視所產生出來的。

北方胡人的有識之士，所提出的這種都市計劃的構想，並未隨着北魏的滅亡而消失，仍與北朝一系的文化傳統流傳，而再實行於東魏首都鄴城。鄴城是接連着三國時曹魏的鄴都南方興建的，後世以三國時的鄴城為鄴都南城；相對的，東魏的鄴城便稱作鄴南城了。

鄴都南城是東魏孝靜帝元象元年（西元五三八年），高歡為皇帝所建造的，與曹魏時鄴城的南面城牆相連，而新建為東魏首都，「武英殿聚珍版全書」所收錄的陸翽所着「鄴中記」的附錄中說：

鄴中南城。東西六里。南北八里六十步。高歡以北城窄隘。故令僕射高隆之更築此城。

此城南面，由東而西有啟夏、朱明、厚載三門；東面由北而南有昭德、上春、中陽、仁壽四門；西面由北而南有納義、乾、西華、止秋四門；北面城牆和鄴都北城的南面城牆相接，由東而西有廣陽、中陽、鳳陽三門。所謂鄴都南城南城的十一個門所指的是東、西、南三面城牆上新設的門，不包括北面的三個門。

關於鄴都南城中宮闕區域及太廟太社位置的勘察，由清代顧炎武「歷代帝王宅京記」卷十二、鄴都南城宮內部，引述「鄴中記」的記載，認為以太極殿為中心的宮闕區域範圍，到達北城，所以它的位置應是在都城中央以北的地方。都城東面有東市的設立，西面有西市。南城的正南門朱明門，門內的朱明門大街南端東側設有太廟；宮闕區域的正南門端門，門外大街東邊南方有大司馬府，端門門外大街西邊北方有御史台；宮闕區域以南一帶，為尚書省卿寺百司令僕以下二十八曹的設置區。若以鄴都南城的都市計劃與中國傳統首都建設計劃比較，則可知：

- (一)與北魏洛陽城同樣違背了中央宮闕的原則。
- (二)與北魏洛陽城同是宮闕區域和都城北面城牆相連接，其間沒有市街的存在，這又與後市的慣例不合。
- (三)與北魏洛陽城同樣在宮闕區域的南方，有官吏及庶民居住區的規劃。宮闕前方允許官員、庶民住屋的存在，與左右民廛的原則相違背。

可見只採用了左祖右社的舊例，在端門外街西御史台的南方，有司徒唐元翳、昌黎王韓長贊的宅第存在；朱明門內南街西邊是錄尚書事和士開的住宅，這些情形令人想起隋大興城即唐長安城的朱雀門外各坊的情形，而東市、西市，也令人想起大興城的都會市、利人市，唐代長安城的東西二市。

關於平城部分，雖不甚清楚而暫予保留，但至少這種

新的首都計劃形式，在北魏洛陽城已建立，並為鄴都南城所繼承。而這是由北朝中有識之士，以批判而不盲從的態度，觀察中國文化傳統，截長補短制定新法，所完成的具體表現。宇文愷必是對北朝文化傳統有所了解，又不盲目崇拜中國文物，更是具有踏實重實踐性格的胡族有識者，所以能擔當大興城興建時的規劃重責，並在任內修正傳統的首都建設計劃，另定新制而大力推行，誠非偶然。

九

由高穎總領營建事務，宇文愷擬制規模，劉龍及賀樓子幹、高龍義負責興建的隋代大興城，不只是都市規劃，甚至其他的官衙建築、門樓的構造，以及城內的寺觀，都與中國傳統式樣有所差異。從史實中可以得到一些證明。

例如宋朝宋敏求「長安志」卷八、崇仁坊條，對於位於北門東邊的寶刹，作了以下的描述：

寶刹寺。本邑里佛堂院。隋開皇中立為寺。佛殿後魏時造。四面立柱。當中構虛。起兩層閣。棖棟屈曲。為京城之奇妙。故天子以寶刹為名。

就中國建築而言，這種建築式樣實在是項特例，可能是一種來自西域，而受中國人歡迎的建築體制。值得注意的是北魏的建築與大興城的興建，雖沒有直接的關連，但這些都是北朝文物和傳統中國文物不同的例證，同時也反映了北方外族對傳統中國文物並非全然的信從。

其次，「長安志」卷八、宣陽坊條，有和大興城興建有著直接關係的有趣記載：

東南隅萬年縣廡。縣門屋宇文愷所造。

萬年縣的廡署建築，是與大興城同時設計興建的，而且都出於宇文愷之手；有關這個建築的以下記述，很值得注意：

太平公主降薛紹。於縣廡設婚席。初以縣門隘窄。

欲毀之。高宗勅。宇文愷所造。製作多奇。不須毀折也。

即太平公主以縣廡為婚禮場所，認為縣門太狹窄，但高宗珍惜這個縣廡是宇文愷所設計的，所以下詔禁改建。由此可見，這種受中國人所喜愛的建築是來自北方胡人文化系統的特殊形式。這也是宇文愷不完全採用傳統中國文物形式而有他自己的抱負，並將之具體實現的一項例證。

從以上的舉證，加上宇文愷本身也出自胡族系統，可知隋大興城的都市計劃，確是有外族文化影響的成分，這種新制的制定絕非偶然。對傳統中國首都建設計劃加以部分修正，姑且不談北魏舊都平城，至少北魏定都洛陽時已有這種的創見，之後為東魏鄴都南城所繼承。但是由於北

魏洛陽城，襲自西晉洛陽城而加以改建；東魏鄴都南城則是以三國時曹魏鄴城擴建增建的，因此在其中，舊有的城市規制仍然存在，是新式首都規劃理想實踐的一大障礙。與隋代大興城比較起來，實行上有較多的不徹底，是可以想見的。北魏洛陽城，在西邊城牆增設承明門，形成東面三門、西面四門相對，是一個實例；而北面城牆的大夏門稍偏東，宮闕區域也在都城中央以北偏東的部位，各個門的方位不能相對應，連結各門的交通幹道也就不能很理想的筆直貫通，是另一個例子。反之，隋大興城在宇文愷的策劃下，位於漢代長安城東南的郊外田地上，並無任何傳統障礙遺存，所以能按照理想計劃逐一實施，北魏時胡人有識者所制定的首都建設計劃，可以說在大興城體現完成。隋代大興城所表現的這種新式的首都計劃，在中國首都建設史上，應當是項進步呢？還是退步？依作者個人的看法，這是一種進步的現象。以下將說明其中的原由。唯其不外是由較富實踐性格的北方胡人中的有識者，針對中國傳統的首都建設計劃，加以改革所促成的。

前朝後市，根據經學家的說法，是含有先義後利的意義；是否這是出自於輕商的觀念，目前尚難斷定，在本文的討論範圍內亦無深究的必要。不過，儒家思想一向尊崇先王之道，多以勸農為富國之本，倡重農主義，以期使天下無不事生產的人，而以士農工商為地位的區等，更以抑商為王道本；若是根據這種思想，則首都建設計劃中採用前朝後市的規制，絕非是毫無理由的。但是從這種治國王道理想的實行結果看來，後市的設置，與都市居民的實際生活甚難調配適應。例如，北宋開封府城內最繁華的地區，就是在皇城的正南門宣德門外，內城以內的東南與西南地區，以及內城的正南門朱雀門外以至外城以內的地方。南宋初期，孟元老「東京夢華錄」卷二、「東角樓街巷」條記有：

自宣德東去東角樓。乃皇城東南角也。十字街南去蓋行高頭街。北去從紗行。至東華門街晨暉門寶籙宮。直至舊酸棗門。最是鋪席要關。宣和間。展夾城牙道矣。東去乃潘樓街。街南曰鷹店。只下販鷹鶻客。餘皆真珠。帛藥鋪席。南道一巷。謂之界身。並是金銀綵帛交易之所。屋宇雄壯。門面廣闊。望之森然。每一交易。動即千萬。駭人聞見。以東街北。曰潘樓酒店。其下每日自五更市合。買賣衣物書畫珍玩犀玉。至平明。羊頭肚肺赤白腰子妳房肚肱鷄兔鳩鴿野味螃蟹蛤蜊之類。……飯後。飲食上市。如酥蜜食棗糖油砂團子香糖果子蜜煎雕花之類。向晚。賣何婁頭面冠梳領抹珍玩動使之類。

東去則徐家瓠羹店。街南桑家瓦子。近北則中瓦。次裏瓦。其中大小勾欄五十餘座。內中瓦子蓮花棚牡丹棚。裏瓦子夜叉棚象棚。最大可容數千人。……瓦中多有貨藥賣卦喝故衣探博飲食剃剪紙畫令曲之類。終日居此。不覺抵暮。

這是對宮城的宣德門外東側、內城東南繁榮景象的描述；同書同卷中的「潘樓東街巷」條，對竹竿市茶坊、妓館等地的繁華也作了類似的敘述。內城的正南門朱雀門門外，即外城以內的東南、西南地區，熱鬧的情形在「東京夢華錄」卷二「朱雀門外街巷」條有如下的描述：

出朱雀門。東壁亦人家。東去大街麥稍巷狀元樓。餘皆妓館。至保康門街。其御街東。朱雀門外西通新門瓦子。以南殺猪巷。亦妓館。以南東西兩教坊。餘皆居民。或茶坊。街心市井。至夜尤盛。此與「州橋夜市」條內詳細的記載相同，其中後者是五代時產生在朱雀門外的繁華區，至後周世宗時築外城將之圍入城內，成為外城以內的鬧區所在。

就明代北京而言，永樂至嘉靖時的北京城，相當於現在北京城的內城，也是依照前朝後市的原則規劃，但是在都城正南正陽門外，却也有繁華市區的產生，結果造成嘉靖三十二年（西元一五五一年）築了現在的外城，將這個區域劃入城內，成為現在所謂的前門外鬧區，其中有名的香藥舖，例如以販賣大虎骨皮膏藥聞名的同仁堂，其建築即是從明初流傳至今，是明代正陽門外，新興鬧區各商店中的一家老店。

以上的例子證實了築有城郭的中國都城，城門外大都是交通要道的所在，由於交通的便利，自然地在城門外，常有繁華市區的形成；同時，與宮闕區域的正門相通的都城正門外的地區，也是交通的樞紐，基於經濟、交通的因素，也很容易變成市區，由此可知，在中國的首都，繁華市區的發達地點，大致是在宮闕正南門前，都城正南城門附近的地方。根據前朝後市，而宮闕區前禁止民居存在的傳統規劃五代開封府、明代北京城，對這種繁鬧市區在宮闕區前出現的自然趨勢，也莫可奈何；而都城正南門前繁華的趨勢，却漸向內發展，而且日益固着，造成後周世宗顯德三年及嘉靖三十二年，不得不為開封、北京修築外城的情勢。雖然現在宮闕區南方有內城正南門的阻隔，但外城以內確有市區的產生，這個趨勢絕非理論，從上述的例子可以知道這是一不爭的事實。

至少，在周代以後的歷代首都，周圍都有城郭的築造，而繁榮市區在都城內產生的現象，也並非五代開封、明代北京城所獨有；事實上，古代齊宣王時、臨淄城稷門外的

繁華，就是一項實例。促使都城中宮闕區域前、城門內外地區，易有市區產生的交通、經濟因素，在此不予討論。所要討論的是有關這種忽視自古以來的自然趨勢，反而拘泥於前朝後市、輕商觀念而與都市居民實際生活無法調整的都市計劃。由於這種規劃，不合居民的生活需要，居民亦無視於為政者所制定的前朝後市的理想，毫無忌憚地群聚在宮闕正門前方，都城正南門裏外區域進行買賣交易，形成繁華的地區。歷代為政者恪守古制，却又難以抑止這種趨勢，只能假外城、內城名目上的區分，而默許宮闕前正南方有關區的存在。事實上，已和傳統前朝後市、中央宮闕、左右民廛的原則背道而行，這些原則自然地遭到破壞，變成後朝前市的現象。

但是北朝中的有識之士，鑑於三國魏都鄴城、西晉洛陽的實際現象，在北魏洛陽城的首都規劃上遂放棄了中國傳統首都計劃的某些原則，而考慮到都市居民實際生活上的需要與便利。所以宮闕區域設在都城中央以北，宮闕區正南門前方也允許住居與商舖的存在。北方有識者雖也一如中國人重視體面，但卻不會讓空泛的理論妨礙了現實的生活，就都市計劃而言，確實較中國傳統更為進步。這種新的計劃理想，由宇文愷在隋大興城實現完成，由於這種進步的計劃構想的實現，隋代大興城的規劃在中國歷代首都計劃史上，可以說是登峰造極的了。畢竟這是基於北方文化背景，對中國文化採取觀察批判態度的胡族有識者截長補短、配合實際生活需要所制定的，並非徒尊先王之道、重表面而為保守、尚思想拘縛、受純粹中國教育薰陶的中國人所能做到的。後來的北宋東京開封府的都市規劃一恢復中國古制，宣德門外、朱雀門外便有市區的再度產生；明代北京城也有類似的情形。誠然中國歷代首都計劃，自古漸次發展，北朝時候外族人士做了部分的修改，促使北魏時有長足的進步，而在隋大興城的完成達到高峯；北宋時再恢復古制，使得進步的趨勢受挫，轉而弛緩；至明清北京城就不再有顯着的進展。簡而言之，中國首都建設計劃在隋大興城達到發展的極致，到北宋東京開封府重行舊制後，就呈現了退步的現象。

十

William Edgar Geil 在「中國的長城」(The great wall of China. 1909. London) 書中談到，自古以來，中國的都市都有城牆作為已開發與未開發地區的分界。在戰爭或土匪侵襲時，都把都邑城門鎖上，來保護城內居民的身家性命及財產；住在城外新興市區的居民就得千方百計地携家帶財逃難到城內；為了保障生命財產

的安全，往往希望城內能允許適合經商的市區存在，在有事之日，就可免於狼狽慌亂。但是，中國傳統的都市計劃，採用前朝後市的古制，不適合新興商賈的實際需要。例如清代北京城，內城為八旗禁衛軍住居的所在，禁止市區存在，商賈為了有事時可迅速入城避難，就將店舖就近設在城門外附近的地方，於是形成了繁榮的商業區。隨着都城外商業區的發達，設備也就相對的增多，如此又使得避難行動有了更多的困難，最後只得增築外城，將整個地區括入牆內，這是一般的習慣，也是前朝後市制，所必然產生的發展傾向。

實行前朝後市制，而在首都城門外有繁榮新市區產生的實例有：西晉洛陽雍門外，以洛陽大市為中心的商業區、五代開封府後周顯德二年之後的城門外關區，以及胡代北京城，嘉靖三十二年正陽門外的市區等等。北魏楊之「洛陽伽藍記」卷四，記有西陽門外即西晉時西明門外四里，洛陽大市以東的通商里、達貨里，大市以南的調音里、樂律里，大市以西的退酤里、治觴里，以北的慈孝里、奉終里，加上準財里、金肆里，共十里，是為重要市區的所在，其文如下：

市東有通商達貨二里。里內之人。盡皆工巧。屠販為生。資財巨萬。有劉賢者。最為富室。云云
市南有調音樂律二里。里內之人。絲竹謳歌。天下妙伎出焉。有田偃起者。善加筮。能為壯士歌項羽吟。云云

市西有退酤治觴二里。里內之人。多醞酒為業。河東人劉白墮。善能釀酒。季夏六月。時暑赫晞。以罍貯酒。暴於日中。經一旬。其酒不動。飲之香美。而醉經月不醒。京師朝貴。多出郡登藩。遠相餽饋。踰於千日。以其遠至。號曰鶴鷄。亦曰騎驢酒。云云

市北慈孝奉終二里。里內之人。以賣棺槨為業。賃輜車為業。有軼歌孫巖。娶妻三年。不脫衣而臥。巖因怪之。伺其睡陰解其衣。有毛長三尺。似野狐尾。巖懼而出之。妻臨去。將刀截巖髮而走。鄰人追之。變成一狐。追之不得。云云

別有準財金肆二里。富人在焉。

凡此十里。多諸工商貨殖之民。千金比屋。層樓口口。重門啟扇。關道交通。迭相臨望。云云

以上是楊銜之對北魏時情形所作的描寫。北魏首都洛陽是襲自西晉，這些繁華的市區，遠在北魏大和十七年定都之前，便已存在。從西晉開始，西明門外的市區，為住在洛陽洛陽城內的居民，提供了極大的便利。無論西晉時因採

取前朝後市、左祖右社、中央宮闕、左右民廛的規制而自然產生，或是北魏時試行新的首都規劃，西陽門外的市區，一直都存在的，這是北魏胡人有識之士有目共睹的實際情形。若探討這十個里的名稱，和里內居民的性質，可以肯定當時同業者是集居一里中，這是唐、宋時同業商店街一「行」形成的先聲。雖然「洛陽伽藍記」中「行的名稱尚未出現，但從同業商店街的實際情形看來，唐、宋時代的「行」，在西晉時或至少在北魏首都洛陽城早已出現。其中慈孝里、奉終里，應當就是白行簡「李娃傳」裏的東西凶肆了。

五代開封府城城門外、明代北京城正陽門外的商業區，各是在後周世宗顯德二年、明世宗嘉靖三十二年增建外城，而成為外城以內的地區，這點在此不再說明。這些完全根據傳統首都建設計劃興建的都城，往往就是這種自然趨勢展現的實例。假使考慮到商業活動的實際需要，避免採用不利於商業的前朝後市、中央宮闕之制，而在都城內允許市區存在於適宜貿易的地點，自然不會有城門外市區的產生，而且也沒有產生的需要。以下簡述不採前朝後市、中央宮闕形式的隋代大興城、唐代長安城，實施後的情形，做為這種推論的論據。

唐代長安城的通化、春明、延興、啟夏、明德、安化、延平、金光、開遠等九門中，交通上以東邊中央的春明門，與西邊最北的開遠門最為重要。前者有向東越過灊水、滻水，傍依驪山水麓的國道經過；更是從華陰經潼關、函谷關到中原地方（即今河南、山西、河北、山東、安徽、江蘇各省）的國道出發點，是往來中原的樞紐。日本遣唐使入京，都採行此一路綫。開遠門則是向西經過今日三橋嶺，再經西渭橋過渭水，從咸陽經興平縣、馬嵬驛、武功縣而到四川成都；或是從渭城以西通往西域地區的國道出發點，是進出西域的門戶。唐玄宗蒙塵入蜀所走的就是這條道路。開遠門的名稱，具有開啟遠方西域各國，前來朝貢的祝禱意味。唐代韓愈所諫佛骨奉迎的行列，就是經開遠門進城，再通過宮城的安福門。但是若是以為春明門、開遠門外，必有繁華的商業區存在，則與事實不符。春明門外，依中國人的習俗是墓地的所在，由水西岸的長樂坡，到春明門之間，僅有長樂驛一個驛店。習慣上，從東部前來長安的人，都越過灊水、滻水，在長樂驛過夜，翌晨再出發，經春明門入長安。「太平廣記」卷二八三、巫類「白行簡」條，引「靈異記」：

唐郎中白行簡。大和初。因大醉。夢二人引出春明門。至一新塚間。天將曉而回。至城門。店有鬻餅餠餠者。行簡餞甚。方告二使者次。

文中記的雖是夢話，但夢仍是基於感覺的實際經驗來的，這項記述，可使人想像今日北平東直門外，當時的情形。東直門外常有二、三家露天攤販，販賣海棠水或麵食，給過路的行人，門外不遠處，街道與墓地相接。「太平廣記」卷二三〇、鬼類十五條，以「華妃」為題，引「廣異記」的記載：

開元初。華妃有寵。生慶生琮。薨葬長安。至二十八年。有盜欲發妃冢。……直達冢中。……及盜載物歸也。欲入春明門。門吏訶止之。乃搜車中。皆珠寶物。盡收群盜。拷掠即服。

這也是春明門外是墓地所在的另一項證明。春明門外情形如此，其他各門也可想見。「太平廣記」卷二八一、夢類鬼神下，「獨孤遐叔」條，引「河東記」的記述：

貞元中。進士獨孤遐叔。家于長安崇賢里。新娶白氏女。家貧下第。將遊劍南。與其妻訣曰。遲可周歲矣。遐叔至蜀。羈栖不偶。逾二年乃歸。至鄂縣西。去城尚百里。歸心迫速。取是夕及家。趨斜徑疾行。人畜既殆。至金光門五六里。天已暝。絕無逆旅。唯路隅有佛堂。遐叔止焉。

這項記載很值得注意，因為由金光門入長安，距居德、群賢二坊以東的西市鬧區很近，而金光門外，竟如此荒涼，連旅店都沒有，可見唐代長安城門外大部分地區，是沒有熱鬧的市區的。也就是說，不採取前朝後市、中央宮闕的形式，而順應商業貿易實際的需要，在皇城南邊有東市（隋時稱都會市）、西市（隋時稱利人市）等商業區的設置，那麼在都城外，就不會有其他商業市區產生了。這也證明了都城內皇城以南的地區，是適合商業交易的地點，這種至少在北魏洛陽時已制定、在東魏鄴都已實行，而在隋代大興城體現的新式首都建設計劃，實在比較能適應都市居民的實際生活需要，所以是項進步的構想。

關於隋代大興城內皇城、宮城位置的分配，向來有這樣的解釋：一般認為因為地形的起伏，東西橫向的高坡形成六道平行綫，正如「周易」乾卦，因此以象九二爻的第二坡，設宮殿，做為帝王之居；以象九三爻的第三坡設皇城，為百司之所在；以象九五爻的第四坡為貴位，有名的崇業坊玄都觀、和靖坊大興善寺，都設在此，以鎮衛都城。宋代宋敏求「長安志」崇業坊玄都觀條、「勒修陝西通志」卷七十三、古蹟條，以及「嘉慶重修咸寧縣志」等等中國人對唐代長安的記述，都採取這種說法。例如「嘉慶重修咸寧縣志」卷三、歷代疆域水道城郭宮室名勝圖中篇，記有：

隋宇文愷置都。以朱雀街南北盡郭。有六條高坡。

象乾卦。故于九二置宮殿。以當帝王之居。九三立百司。以應君子數。九五貴位置元都觀及興善寺以鎮之。今自鐵爐廟村北迤西有原。當即上九岡。興善寺坡為九五岡。城內鼓樓直南地迤高若脊。正值唐皇城百司地。當即九三岡。餘三岡雖無可確指。要皆龍首之支脈也。

但是，所謂做為都城鎮衛的上述寺、觀，地點正好在都城的中央，隔朱雀門大街而東西對應的說法，並不足信，況且地點的所在，是否是象九五的第四坡，也尚難確定。總之，這種說法，只是經過實地的勘察後，所作的附會，或偶然的譬喻。否則，對於大興城首都計劃的先驅——東魏鄴都南城，更早還可以追溯到北魏洛陽城的規劃，就難以解釋了。作者個人認為，以宇文愷對首都建設的規劃，只是純然為了配合乾卦的地形，而將皇城宮城的位置，置於都城中央以北的說法，是不足採信的。

就首都的全盤價值而言，隋代大興城即唐代長安城固然仍有某些缺點，但却無法否認，這是中國史上的一等首都。本文以首都的都市計劃為研究主題，從這樣的觀點探討隋代大興城及唐代長安城的都市計劃規模，則它不但是中國史上的特例，更是中國首都建設計劃史上最具價值，甚至可以說是空前絕後的一項成就。